

中國醫史

王 喜 民 著
伍 連 德

HISTORY
OF
CHINESE MEDICINE

WONG AND WU

上海辭書出版社



HISTORY
OF
CHINESE MEDICINE

中

國



上海辭書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中國醫史=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:英文 /王吉民,伍連德著. —上海:上海辭書出版社,2009.4

ISBN 978-7-5326-2810-0

I. 中... II. ①王...②伍... III. 醫學史—中國—英文 IV. R-092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09)第 037345 號

責任編輯 王有朋

助理編輯 全熾熾

裝幀設計 姜明

中國醫史

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

王吉民 伍連德著

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、發行
上海辭書出版社

(上海陝西北路 457 號 郵政編碼 200040)

電話: 021-62472088

www.ewen.cc www.cishu.com.cn

上海展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開本 787×1092 1/16 印張 66.5 插頁 5

2009年4月第1版 2009年4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6-2810-0/R·35

定價: 300.00 元

如發生印刷、裝訂質量問題,讀者可向工廠調換

聯繫電話: 021-66511611

序

《中國醫史》再版

王吉民、伍連德兩位先生撰寫的《中國醫史》是第一部用英文全面闡述中國醫學歷史成就的光輝巨著。此次上海辭書出版社要將其影印出版，我感到十分欣慰。出版社的同仁希望我寫幾句話，我就將自己近年來的一些思考，進行簡單梳理，權作引玉之磚。

其實對醫學史，我也是初窺其徑。雖然從讀書到工作，幾十年間我都沒有離開過醫學領域，然而真正關注醫學史，卻是晚近之事。2003年“非典”肆虐期間，我開始研究傳染病的歷史，之後對醫學史興趣日濃。通過研究醫學史，我對醫學的本質以及發展規律有了更深入的認識，也深刻地感受到當前醫學與人文日益脫離的趨勢，這就更讓我堅定了醫學應當回歸人文的理念。

古往今來，各類史作可謂汗牛充棟，然而傳世的醫學史卻寥若晨星。這大概是由于醫學史的特殊性造成的，醫學史難寫，因為它不僅僅是醫學科學和技術的歷史，更是對生命、生、死以及與之相關的人生問題的認識史；它不僅是經驗的、邏輯的，同時也應是哲學的、審美的、人文的。回溯醫學史，就是對醫學價值的精神回歸。

我始終認為，醫學之目的原本是解救疾病苦難之中的人，這包括生理上的治癒和精神上的慰藉。但是，我們不得不面對這

樣的現實：當人類已經能夠將視角深入到細胞、分子乃至更微觀的層面，征服越來越多疾病的同時，醫學正與它最初的目標漸行漸遠，技術的飛躍讓醫學擁有了獨立的價值，并使這種價值不斷強化，人的存在卻被不斷地忽略和解構。湯因比在《人類與大地母親》中的詰責令人振聳發聳：“人類精神方面的不健全已給社會進步造成障礙，因此也給技術進步帶來障礙”，“人類將會殺害大地母親，抑或將使她得到拯救？如果濫用日益增長的技術力量，人類將置大地母親于死地。”同樣地，技術至上、忽視人文也會讓現代醫學進入死胡同。當冷漠取代溫情，當交流變得奢侈，當診療成為流水線上機械的重複，醫學也就蛻化成被藥物和儀器所役使的工具，醫患關係也隨之由親密轉為緊張。

在如今這樣一個社會轉型的大背景下，醫療已經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，而構建和諧的醫患關係，則是比解決“看病難，看病貴”更為複雜和更具根本性的問題。如何讓迷失在技術叢林中的現代醫學回歸人文，如何讓人性 and 關懷重新成為醫生與患者之間的橋樑，這需要我們每一個從醫者去思索、去探究，而學習和研究醫學史則是必須要做的功課，我們可以從中發現醫學的真諦，找回塵封了的對病人的愛，喚醒最初選擇醫生這個職業時的崇高的心靈。

對於中國醫學界來說，關注醫學史不能僅僅關心現代醫學史，而同時應該回到祖國傳統醫學的源頭去尋找我們的根。中華民族得以數千年繁衍昌盛，以中醫為主流的傳統醫藥功不可

沒。然而，有着輝煌成就的中國醫藥學因封建帝國與世界政治、文化的隔絕而鮮為世界醫學界所瞭解，也因此失去了與現代醫學相互促進和融合的機會。上世紀三十年代，王吉民、伍連德兩位前輩著述《中國醫史》的初衷正是深感于中國醫學在世界醫學史界的缺位，而立志于向世界介紹。今天，當我們有機會重新閱讀和審視這部著作時，除了慨歎前人筆路藍縷開創的光榮，還要承擔起歷史交給我們的責任，那就是更深刻地瞭解祖國傳統醫學并向世界介紹，以及在當今現代化進程中，尋求中醫突圍、發展的方向和途徑，創立新醫學。

自從西醫傳入中國以來，關於中西醫的種種辯爭就不絕于耳，各方對此莫衷一是。其實，爭論焦點就是對中醫價值的認識。陳寅恪在《馮友蘭〈中國哲學史〉上冊審查報告》中提出過這樣的觀點：“凡著中國古代哲學史者，其對於古人之學說，應具瞭解之同情，方可下筆。”這個原則也同樣適用於中醫，如果沒有對祖國傳統醫學的深刻體悟，就難言揚棄。作為中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，中醫的原理和精神與中國傳統的宇宙觀、生命觀、人生觀一脈相承。我覺得，除了幾千年積累下的醫藥經驗和知識外，中醫的價值還重要地體現在對生命的認知和醫學的根本見解上。

在中醫看來，生命是宇宙的一部分，生命運動和宇宙的運轉遵循同樣的法則。這種“天人合一”的思想是中醫的理論基礎，它並不意味着人被抽象和渺小化了，恰恰相反，生命的意義和價

值被擴大和提升了。生命是一個有機的整體，是一個完整的過程；疾病是生命自身運動的過程，而非生命的敵對方，古人有云：“生老病死，時至則行”（《因話錄》卷二），說的就是這個意思。站在時代的潮頭重估中醫，我們可以看到，祖先們把醫學並不當做簡單的治病，而是通過對生命體的調節，使其實現平衡，達到生命狀態與自然狀態的協調統一，保持生命過程的和諧。這種和諧表現為人體各部分之間的和諧、人體與精神和諧以及人與自然的和諧，它反映出中國人在把握人與自然關係上的高度智慧，也讓醫學超越于一般的經驗科學，而具有了博大寬廣的宇宙關懷。

中醫是以人為本的。它強調醫生與病人的溝通，望聞問切就是醫生與病人的真誠交流和情感對話，它在診治中也特別注意人的心理活動，關切人的內心感受，而這又與中醫仁愛救人的準則始終相隨。在古代中國，醫術被稱為“仁術”，仁者為愛人，因此，在中國傳統中，尊重生命、關愛病人是醫生的基本道德。最好的醫生並不一定是診療技術最高明的，但必然具備高度的仁愛精神和高尚的道德人格。大醫之道在精誠，孫思邈“凡大醫治病，必當安神定志，無欲無求，先發大慈惻隱之心，誓願普救含靈之苦”的警語，就是對醫生境界的精闢闡釋。

不可否認的是，在科技革命和經濟全球化兩股浪潮的激蕩之下，今天的中國傳統醫學面臨着比王、伍兩位先生著書時更為窘迫的境地。中國傳統醫學在當今醫學系統中究竟應該如何定

位，應該沿着什麼方向和途徑發展，中國傳統醫學是在抱殘守缺中沉淪，還是在融合創新中涅槃？這是《中國醫史》對我們的拷問。

歷史告訴我們，一個偉大的民族，必然是善于傳承和發展自己優秀的主流傳統文化的。對於中醫，我們應該深入地去瞭解它，應該對它懷有溫情與敬意。我們要清楚，西醫和中醫的區別不是簡單的新舊之別，更不是先進和落後能一言以蔽之的，它們是兩種文化、兩種哲學的差別。發展中醫，並不是醫學的一個流派對另一個流派的反抗和復辟，而是使相異的醫學傳統在交流中共同推動整個人類醫學的進步。

是為序。

韓啟德

二〇〇九年二月

王吉民和中國首家醫史博物館的創辦

王吉民(1889—1972)，字嘉祥，號芸心，著名的醫史學家。出生于廣東東莞，因父親任職于香港基督教會，王吉民7歲到香港，先後進入香港聖保羅書院、皇仁書院讀書。16歲考入香港西醫大學堂習醫，21歲畢業後，歷任外商輪船公司船醫、滬杭甬鐵路管理局主任總醫師、浙江省郵政管理局局醫等職。1937年春，應中華醫學會之請，王吉民到上海協助辦理中華醫學會之會務。他還擔任過浙江醫師及藥劑師公會會長、中華醫學會副會長等。1949年，國際科學史研究院(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History of Science, 簡稱 IAHS) 授予王吉民通訊院士。1966年，該研究院又授予王吉民院士，他是中國醫史界第一位獲得國際科學史研究院的院士殊榮者。

王吉民畢生對中國醫學史的研究與弘揚，作出了重大貢獻。在他的諸多業績中，他主持籌劃、負責創辦的中國第一家醫史博物館，是中國醫學史事業中的大事之一，也是中國博物館發展史上重要一頁。

中國第一家醫史博物館的創立，王吉民固然是主要籌劃與負責者，但另一位西醫伍連德博士，與該館的創辦也有着密切關係。

伍連德(1879—1960)，字聯星，原籍廣東新寧(今臺山市)，檳榔嶼華僑。1905年畢業于英國劍橋大學公共衛生學系，1910

年回國，擔任東三省防疫處長。他在 1916 年前後，瀏覽過美國醫史學家嘉立森 (Garrison, F. H.) 編著的《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Medicine》(《醫學史》)，在這部論述世界醫學史專書的 700 多頁之中，談到中國醫學的內容，卻一頁也未滿，並且有謬誤。因此，伍連德致函該書作者質詢：何以對中國醫學介紹得如此微少而又作出不正確評價？該書作者回信給伍連德，說：中醫或有所長，但未見有以西文述之者，我這部書的半頁資料，猶屬外人之作，參考無從，遂難立說，簡略而誤，非余之咎。伍連德讀到嘉立森回信後，震動很大，隨即把該信轉給好友王吉民一閱。王吉民看了嘉立森寫給伍連德的信之後，感觸也很深。伍、王兩人都深感作為從事醫學專業的中國知識份子，很有必要對中國醫學史進行深入學習與研究，將中國醫學歷代之發明創造與寶貴內容，向中外人士廣為介紹宣傳。於是，他倆除了各自分別撰寫發表文章論述中國醫學歷史成就外，還協力合作，經過 10 年時間，用英文撰寫成《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》，同時還冠以中文書名《中國醫史》，于 1932 年出版。王吉民和伍連德在寫作醫史專著過程中，還特意陸續收集醫史文物。至 1937 年 4 月，中華醫學會在上海舉行第四屆全國會員代表大會，王吉民負責主持籌備的“醫史文獻展覽會”，在大會期間正式展出，展品達 1000 餘件，其中包括中華醫學會撥款購得者、私人捐贈以及借展者。展品種類有中國歷代制藥工具、藥瓶、針灸與外科用具、中醫古籍、歷代中醫家傳記與畫像、醫事畫等。各界人士參

觀後，對之產生了很大興趣，一些報刊曾予以報導并給以好評。在此次會議中，王吉民作了“籲請籌設醫史博物館”的專題講演，得到中華醫學會許多與會者和一些熱心人士的贊同與支持。因此，在此次“醫史文獻展覽會”結束後，其中一部分展品留作爾後創辦醫史博物館的陳列品予以保存。

為了儘快促進中國第一家醫史博物館早日誕生，1937年5月，王吉民又在《中華醫學雜誌》上，發表了《籌設中國醫史博物館芻議》一文，明確提出創辦該館的三個主要目的為：①收集歷代醫史文物，“妥辦保存，以免散失”，使“國粹不致外流”；②將所藏之文物，“供學者研究，藉以考察醫學之變遷，治療之演進”；③“對學生為有效之教授方法，對民眾可作宣傳醫藥常識之利器”。但令人憤慨的是，1937年7月7日，日本軍國主義發動了“盧溝橋事變”，繼而上海被日本侵略軍所占，當時籌建中華醫學會醫史博物館的條件與經費等都發生了很大困難。然而，在中華醫學會的支持下，王吉民經過多方努力籌劃、克服困難，以及在一些熱心人士的贊助下，中華醫學會醫史博物館終於在1938年7月誕生，王吉民被推舉為館長。

最初，醫史博物館的陳列室，是利用中華醫學會圖書館內的一個小房間，地點在上海池浜路（後更名為慈溪路）。陳列品約400件，包括中醫用具、制藥工具、藥瓶、名醫手筆、中醫古籍、醫事畫等。

醫史博物館創立之初和以後一段時期，適值抗日戰爭，中華

醫學會總會由上海遷往重慶，因此，留在上海的醫史博物館由于經費、時局等原因，發展緩慢。抗日戰爭勝利後，中華醫學會總會遷回上海，醫史博物館的業務有所發展，藏品陸續得到增加。1949年10月新中國成立後，醫史博物館獲得更好的發展。1956年，中華醫學會上海分會會址搬遷到上海市北京東路“國華大樓”，醫史博物館的陳列室增辟為五大間，並設有辦公室、醫史資料室、文物登記室、文物倉庫等。1959年1月，上海市衛生局決定，中華醫學會醫史博物館改屬上海中醫學院，館址遷至該學院內，王吉民先生繼續擔任館長，直至1966年夏。

為了充實醫史博物館的文獻、照片等，歷年來，王吉民陸續把自己收藏的醫史文獻資料和文物，贈送給醫史博物館，直到1969年在他80歲高齡時，又把歷年收藏于自己家中，便于自己在家裏研究參考的中外醫學史著述、雜誌等700餘冊，全部贈送給上海中醫學院醫史博物館。正是王吉民對所創辦的中國第一家醫史博物館傾注了畢生精力，捐贈了大量醫史文物及文獻等，為該館爾後的發展打下了扎實基礎，對中國醫學史的研究、教學、弘揚、普及等，產生了良好的社會效益。

傅維康

(轉載自《上海中醫藥雜誌》2008年第42卷第7期)

中國近代傑出的醫學家——伍連德博士

近代世界醫學史上，自從開始舉辦國際性質的醫學衛生會議以後，相當長時期裏，在世界上擁有人口最多的中國，卻無緣派出代表參加會議，更遑論中國代表在國際醫學衛生會議中擔任主席。直到西元 1911 年 4 月，在瀋陽舉辦“萬國鼠疫研究會議”，中國代表伍連德博士被推舉為主席主持會議，從而大大提高了中國人民的民族自豪感。

伍連德(1879—1960)，字星聯，出生于當時是英國屬地的馬來亞檳榔嶼華僑之家，祖籍廣東新寧(今臺山市)。7 歲時在當地收費低的“大英義塾”學習，成績優秀，17 歲時考取到英國皇家獎學金而進入劍橋大學學習。至 1899 年獲得文科學士學位。之後，他除了繼續學習文科課程，還就讀于倫敦聖瑪麗醫學院，4 年學習成績均優，獲得數種獎學金，至 1903 年 8 月，先後被授予文科碩士、外科學士和醫學博士學位。為學習和掌握到更多知識與技術，他還陸續到英國利物浦熱帶病研究所、德國哈勒衛生研究所、法國巴斯德研究所深造，專門進修傳染病學、熱帶病學、微生物學和衛生學。

在國外求學 7 年後，于 1903 年 10 月回到檳榔嶼。1905 年初在當地開始行醫。1907 年 7 月，他應直隸(河北)總督袁世凱之聘，到天津北洋軍醫處任職，不久，因病回檳榔嶼療養。1908 年 5 月再次應聘到天津陸軍軍醫學堂擔任“會辦”(相當于副校

長)。

1910年冬，西伯利亞發生肺鼠疫流行，不久即蔓延傳入中國滿洲里，接着又波及哈爾濱一帶，并繼續向華北擴展，疫情十分嚴重。短短幾個月裏，鼠疫在東北就奪走了6萬餘人的生命。當時正值清末，國勢衰弱不堪。沙俄和日本都以保護本國僑民為藉口，企圖獨攬中國的防疫權，有人甚至聲稱中國無人能勝任領導防疫工作。伍連德聽到此種侮辱性言論後，深為憤慨，力加駁斥。由于他所具有的多種學歷和廣博的知識，因此不久由清政府任命他為東三省防治鼠疫全權總醫官。于是，他帶領多名學生前往東北開展防治鼠疫的工作。

伍連德到達東北後，不畏懼肺鼠疫的嚴重傳染性，親自深入疫區第一線進行調查，研究防治對策，開展防治工作。在他的組織領導下，經過群眾的努力，疫情逐漸得到控制，在4個月內終于將這次鼠疫撲滅。

1911年4月，“萬國鼠疫研究會議”在瀋陽舉行，參加會議者有中國以及英、美、俄、德、法、奧、意、荷、日本、印度和墨西哥等12個國家的代表。會議中，伍連德被一致推選為會議主席，這也表明他在領導防治鼠疫工作中所取得的重大成績和崇高威望。當年他才32歲。

會議結束後，伍連德特向清政府建議，在北京設立京師防疫事務局，在哈爾濱設東三省防疫事務處，在山海關、營口設檢疫事務所，以便持久地開展防疫工作。

不久，東三省防疫事務處設立，伍連德被任命為處長。辛亥革命勝利後，伍連德雖然被聘請兼任總統府侍從醫官，但是他仍然很關心東三省的防疫工作，並且向政府建議開設濱江、滿洲里、齊齊哈爾、拉哈蘇蘇四所醫院，以加強東北地區對傳染病的防治力量。

1924年，伍連德到美國霍普金斯醫學院留學，次年獲公共衛生學碩士學位。其間，他還參加在檀香山舉行的太平洋食物保全大會。回國後，繼續擔任東三省總防疫處總辦，還兼任營口臨時防疫處名譽總辦。1926年，伍連德以他在東北防治鼠疫的成果，獲日本東京帝國大學醫學博士學位。1927年，國際聯盟衛生組織邀請伍連德到一些國家考察，並作為中國的代表出席國際聯盟在印度召開的遠東熱帶病學會議。其後，他受張作霖的委託，在瀋陽籌建東北醫院。

1930年5月，伍連德受衛生部的委派，到上海籌備接管全國海港檢疫事務。7月，中國在上海成立了海港檢疫管理處，伍連德被任命為處長。就在這個月裏，伍連德代表中國首先在上海從外國人手中收回了海港檢疫權。9月，衛生部委派伍連德兼任上海港檢疫所所長。1937年日本軍國主義發動“蘆溝橋事變”。“八·一三事變”後日軍侵佔上海，當年10月，伍連德辭職移居香港，不久定居于馬來亞，後來在怡保市開業行醫。

伍連德不僅對中國近代防疫事業做了大量工作，貢獻卓著，同時還很熱心于中國的醫學公益事業。他大力呼籲籌建中國現

代醫院和西醫學校。1915至1916年間，他主持籌建了北京中央醫院，擔任第一任院長。1926年，在哈爾濱創辦了哈爾濱醫學專門學校，擔任首任校長。他是創辦中華醫學會的積極主張者和籌建者之一，1915年，他與當時我國一些著名的醫學界人士顏福慶和俞鳳賓等，在上海創立了中華醫學會。1916年，在中華醫學會第一次大會中，伍連德被推選為會長，第二屆連任，同時兼任《中華醫學雜誌》總編輯。

1919年1月，伍連德以中華醫學會會長身份，代表中國外交部查驗上海海關封存的價值達2400萬元以上的鴉片煙土1200箱，隨即進行監督燒毀。1931年2月，他在《醫藥評論》雜誌上發表《流毒已極之鴉片問題》，歷數鴉片對中國人民之嚴重危害，並陳述禁絕鴉片的步驟和措施。

鑒於民國初年以前中國無詳細的人口生命和疾病統計資料，伍連德在1919年發表的《論我國人口生死疾病統計急宜調查》一文中，力陳在中國進行人口統計對發展醫學、增進人民健康的意義，認為這也是中國醫學界的一項重要工作。

伍連德早在留學德國、法國期間，就對科學技術發展的歷史產生了濃厚的興趣。回國後，他致力研究中國悠久的醫學史，在對中外醫學發展歷史的比較中，感慨良多。他在1919年發表的《讀日本醫學史感》中寫道：“詩有之：‘他山之石，可以攻玉。’吾讀日本醫學史，而不禁有感焉。”他說，中國醫學起源甚早，並且在兩千年前就陸續流傳到日本；而到近代，中國醫學的進步反不

及日本，認為這與清末以迄當時的政府未採取有力措施有關。因此他在文章中大聲疾呼，若不積極發展中國醫學，則“將何以強其種、強其國哉？更何以與東西各國競雄哉？誰實使之？孰令致之……亦政府督促之未至也。吾因函書此以警醒我國人，殷望我政府，并警告我同業。”

1927年，伍連德在為醫學史家陳邦賢先生的《中國醫學史》所寫序言中，談到學習醫學史的意義，認為可以“知醫學各科，皆古疏今密，古拙今巧，由簡單而日趨于繁曠，實足為促進吾國醫學之良導線也”。

伍連德看到國外的醫學史著述中，有的也涉及中國醫學的一些內容。但他認為著作中所談到的中國醫學，“往往多所乖誤，而未能得其真相”，因此甚為遺憾。1915年，當他讀到美國醫史學家嘉立森（Garrison, F. H.）的《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Medicine》（《醫學史》）中有關我國醫學的敘述後，很是不滿。該書是1913年出版的論述世界醫學史的專書。全書700餘頁。他發現其中談到中國醫學的內容，連一頁也不足，而且其論述既膚淺，結論又有錯。他出于對祖國科學發明的榮譽感，特致函嘉立森質問。嘉立森復函進行申明說：中醫或有所長，但未見有以西文述之者，我這部書的半頁資料，猶屬外人之作，參考無從，遂難立說，簡略而誤，非余之咎。

伍連德看過嘉立森的回信後，將它轉給一位研究醫學史的好友王吉民看，因為王吉民在此之前已讀過嘉立森的《醫學史》